

從東亞歷史與文化認同看「東亞共同體」如何可能——葛兆光的幾個方法論問題之省思⁺

徐興慶*

前言

「東亞」曾經有過的頻繁的交流，也存在著複雜的歷史糾葛，但隨著東亞國際局勢的變遷，逐漸為人所遺忘。葛兆光教授從歷史學者的角度及現況演變的觀點，探討東亞各國的文化認同問題，「什麼是東亞各國彼此認同的基礎？」的提法，給了我們一個宏觀的視野，點出了近現代東亞各國關係的複雜性及困難性，這種思維當然可視為一種理論架構的模式，放在「歷史脈絡」與「文化認同」架構中來思考東亞歷史文化中的異同爭論與解決的方法，自有其理論的依據。筆者依大會的安排，先拜讀了葛教授〈為何是東亞？如何才認同？——有關東亞歷史與文化的再思考——〉的文章，針對相關內容有如下心得與一些粗淺的看法，就教於

各位先學、先進。

葛兆光對東亞「文化認同」的理論基礎

(一)三個要素

一是承認過去東亞曾經有一個共同的歷史淵源或共用一個共同的文化傳統；二是承認東亞與歐美的文化異差；三是視「亞盟」或「亞洲共同體」為一個共同的道路和目標。葛兆光指出建立東亞共同體首先要有文化認同，文化認同又需要重新回溯歷史。他也認為經濟的一體化，在越來越互相依賴的時代，是很容易形成的，而政治上的互信，在政治意識形態不同的時候，很難達成，只有文化上越來越有認同的時候，才可能形成「共同性」，這種論點非

⁺ 本文係針對「第一屆亞洲未來論壇」（泰國曼谷，2013年3月8-10日）擔任大會人文科學領域專題演講（演講人：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高等研究院院長〕：〈為何是東亞？如何才認同？——有關東亞歷史與文化的再思考——〉）之回應文。

*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本院「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執行長。

常務實。現今資本主義瀰漫全球，大家求新、求變、求利、求名的風潮日益猖獗，致使各國政府常以經濟利益為先，以政治的意識形態批評或要求對方配合，而忽視了客觀的自我認識之重要性，提議多年的「東亞共同體」為何總是無疾而終，值得吾人從近代東亞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深入省思。

(二)從歷史脈絡認識東亞文化異差的現實性

葛兆光思考東亞文化認同的第二個焦點是，必須認清漢唐文化基礎上的東亞諸國文化共同體是消弱甚至已經崩潰。現今的東亞各國彼此充滿輕蔑和誤解、鄙夷和偏見，其形成的原因雖然複雜，但必須加以釐清，找回原因，消弭歧見，才能找回東亞各國之間的共識和認同。葛兆光重新構思「文化認同」的提法，點出各國重政經而輕人文所造成的結果，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他呼籲大家關注「文化認同」被忽視的歷史過程。舉例而言，他說：

岡倉天心在《東洋の理想》裡面曾經信心滿滿地說，「亞洲是一個」，這是針對「歐洲」而言的。可是「亞洲」真的是一個嗎？且不說文化差異很大的南亞、中亞和西亞，就是我們向來認為有共同文化的「東亞」，似乎也存在問題。

明治期的日本，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的勝利，轉換了它在亞洲的國家地位，岡倉天心的「亞洲是一個(Asia is one)」主張已經過了一百年，學術界也經過諸多正反意見的辯論，他在《東洋の覺醒》(*The Awakening of the East*, 1902)也提及「歐洲的光榮即是亞洲的屈辱」，論述東亞的解放與戰爭的意識形態。他以歐洲為假想敵作為問題意識，將之套在東亞

文化發展的脈絡來思考，曾經說：「日本的藝術史等於亞洲理想的歷史」、「日本是亞洲文明的博物館」、「日本是近代的強國」，這些話語即是以「自國為中心」的意識形態，他扭曲了東亞文化原來的風貌。

事隔近百年，曾經擔任日本外交部長的柿澤弘治在〈アジアは一つ、いまこそ〉一文中，呼籲日本人勿刻意強調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必須拋開了自我中心的思維。他說：

我們日本人，動輒就說：「日本人是住在遠東的島國，具有獨特的文化。如此，容易陷入孤立國家的泥沼，或給人有排外的國家主義之負面印象。為因應 21 世紀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特別是為了要建立與東亞的鄰國的和諧關係，我們必須捨棄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¹

我認為，柿澤弘治的說法才是現今東亞各國取得「共識」必須努力的方向。尤其在 21 世紀全球化的進程中，東亞各國在經濟面的相互依存度日益提升，但政治層面的立場與主張仍然停留在各說各話的階段，時而若即若離，時而漸行漸遠，其間存在著諸多矛盾及不確定因素。呼籲各國捨棄傳統包袱及自我意識，才是重建彼此未來互信的基礎。

葛兆光已經體會到，中國人口中的「同文同種」、「一衣帶水」、「漢字文化圈」、「儒家文化」等過去的文化共同性已經消失，所以才會提出重建一個歷史共識和文化認同，容納東亞內部各國文化不同的差異性，以尋求彼此認同的基礎。基本上，我同意葛兆光從東亞歷史脈絡的演變過程思考「文化認同」的相關問題，但也提出一個文化認同與政治的問題

¹ 柿澤弘治：〈アジアは一つ、いまこそ〉，收於東海大學平和戰略國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に「共同體」はできるか》（東京：社會評論社，2006 年），頁 18。

請大家一起思考。

臺灣學者楊儒賓在〈雙源、多源與差異的統一〉一文中指出：

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讓文化的因素老是糾結於政治的困境當中，在中國近代史的脈絡下，任何人幻想文化可獨立於政治之外而運作只能說是幼稚，但任何人如認真認為政治的邏輯決定文化的走向，其錯誤更是不可思議。²

這句話點出了文化要素與其發展欲與政治因素撇清關係是困難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依筆者的看法，未來也難有改變。我們可以同一標準，將楊儒賓的指責，放在日本、韓國、臺灣的歷史脈絡中一併思考，其答案也是一樣的。只有學術界的人士，在認清文化認同的問題癥結後，可與政治分流提案，以期為達到「東亞共同體」究竟有那些議題可以獲得共識與目標。葛兆光以歷史學者的立場，從「政治互信已經消失，文化認同怎麼能有呢？」的危機意識角度切入思考問題，也印證了與楊儒賓的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客觀論析了東亞文化認同的真實性與複雜性，企圖打開這個現實而難解的習題，見解中肯，令人佩服。

思考「東亞共同體」如何可能的前提：鑑古思今，求同存異

「東亞」這個概念被提起，在不同的時代都有它不同的意涵。明治以後的日本面對與歐美的關係，產生了「興亞」與「脫亞」的兩派思惟，「興亞」在先，「脫亞」在後，將西洋文明視為日本近代化的「他者」，兩次的戰利，將自己定位為東洋最先進的國家，其成立過程都經歷了以國家利益優先的盤算，而忽視

了文化認同及相互影響的事實。從現代的角度而言，現今生活在東亞區域的人來說，不能僅作歷史的回顧或只有考慮「東亞」的問題，必須從超越「東亞」的全球化來思考問題，因為東亞現況的變遷，日新月異，所謂「東亞新秩序」隱然形成，其步調快到我們幾乎難以適應，無法捉摸，而「東亞共同體」如何可能，卻是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問題。

(一)東亞「區域合作」的新構思

日本從 20 世紀中期開始提倡「環太平洋經濟合作」，以「亞太」（非亞洲）的概念，主要將美國拉近亞洲，自己扮演美亞橋梁的重要角色，並提升日本在東亞的戰略地位，也企圖在東亞扮演自由貿易協定（FTA）交涉的核心國家，開始構築「東亞共同體」的再實現。韓國的知識界則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提倡「東亞論」，尋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緣文化的東亞和平論、超越中華主義與東洋主義的東亞均衡論，在 FTA 首腦會議提倡「東亞論壇（East Asia Forum）」³。20 世紀末起，廣域的東亞經濟圈開始提出「區域合作」的構想。2002 年 11 月，中國與東協（ASEAN）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後，掌握了與東亞各國經濟合作的主導權（initiative），2003 年 9 月發起「東協+三」（NEAT, think-tanks, network），開啟了東亞「區域合作」的可能性，但這些構想大多充滿自我意識，常與現實及互利的層面脫節，至今仍難具體實現。

進入 21 世紀，東亞的國際環境更加複雜，各國對自身的利益都有自己的盤算，歧見頻出，亦即，葛兆光所提「意識形態各走各路，政治制度差異很大，彼此的緊張和偏見，致政治信用度、文化認同已經消失」，因此，要重新架構東亞的區域整合，困難度是越來越

2 楊儒賓：〈雙源、多源與差異的統一〉，東亞歷史文化交流中的共性與殊性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12 年 12 月 14 日）。

高。近百年來，不斷失敗的歷史過程已經告訴我們，戰時下「東亞」概念與現今持續進行的實體化「東亞概念」是不同的，大家在「求同存異」的共識尚未達成之前，「東亞共同體」只會停留在構想、願景或是喊口號的階段而無法付諸實現。因此，東亞區域的殊性中，認知到互利、共存的可能性及必要性，已是必須思考的緊急課題。

三年前，日本政黨輪替，民主黨取得政權，諸多中外觀察家認為民主黨的施政方針與明治維新「脫亞入歐」有別，「入亞」（特別是關注中國）才是主流政策，但 2012 年 12 月自民黨安倍政權重新奪回政權後，重申「美日安保」及與東協（ASEAN）合作的重要性，更將復甦日本經濟列為首要任務，逐漸將政策重心轉向東亞區域主義，除了凸顯日本是要取得東亞權力的平衡，也被解讀是在牽制中國的崛起。凡此，在在顯示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各國都在尋求自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日本如此，中國如此，韓國亦復如此，而臺灣在尋求如何自保、發展經濟的大前提下，又何曾是例外？

（二）研究中國史的日本學者對中日緊張關係的聲明文

針對中日關係日益緊張的情勢，日本歷史學者久保田文次（日本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小林一美（神奈川大學名譽教授）、佐藤公彦（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多田狹介（日本女子大學名譽教授）、狹間直樹（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濱島敦俊（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森正夫（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等人於 2013 年 2 月 19 日發出如下的一篇聲明文：

日本和中國作為親近的朋友，
結好為鄰，我們強烈希望這種
睦鄰友好關係今後亦能長久地
保持下去，也正因為如此，我

們對日中兩國之間此番圍繞尖閣列島的糾紛和由此帶來的緊張關係深感憂慮。我們認為，同樣的錯誤不可重犯。近代以來，日本和中國都走過了各自的道路，而兩國之間不幸的關係也在這當中孕育和展開。日本經歷了重大的歷史錯誤，那就是軍部和政府在新聞報導和學術出版等各個方面將資訊控制到極端的程度，致使國民對外界一無所知，從而挑起沙文主義（排外的愛國主義），邁出了侵略的一步，作為其結果便是走向空前的全面戰爭。我們衷心地期望不僅僅是日本國民，世界各地所有國家的國民都能共同擁有這一負的歷史經驗。在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之後，我們日本人開始反省戰爭，相信各國人民的公正和信義，在和平憲法下與近鄰各國和世界各國和平相處，友好交往，追求自由與和平。當然，在這期間，或許很難說對戰爭遺留問題的處理獲得了充分的解決，然而在這數十年裡，日本國民對和平與友好的真摯尋求則是不能否定的歷史性事實。中國人民在近現代的苦難和桎梏當中尋求解放，不斷苦戰奮鬥的歷史，是我們這些在此文之後聯名的中國史研究者共同擁有的學術原點，在對中國朋友們深表敬意的同時，我們也明確認識到日本對那段苦難的歷史負有重大責任。我們認為，兩國之間和平、良好的關係必須永久地保持下去，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這是近現代歷史給予我們的強有力的教訓。我們認為，見解可有不同，情感可有齟齬，但兩國國民是「亞洲」的近鄰，應當尊重歷史孕育出的共同「文化」和各自的「個性」，以確立共

同擁有「共存」之未來的意志，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必須為此而努力。我們感到憂慮的是，目前的對立狀況倘若延續下去，會導致事態惡化，兩國之間極易釀成狹隘的沙文主義的「對抗狀態」。幾經戰爭之悲慘的國際社會，顯示出不以「武力」而是以和平手段來解決對立與糾紛的智慧，創建了國際和平機構，即聯合國和國際法庭。我們認為，活用這一在犧牲無數生命的基礎上確立起來的通過理性和智慧來解決問題的系統，應該是值得兩國尊重的方向。在此，我們向兩國政府、各個民間團體和兩國的每一位國民強烈呼籲，言而無忌地去討論，而不夾雜武力，以旨在尋求共存的反復「對話」來解決問題，如果仍不能充分解決則應該活用國際上的解決系統來解決。未來只能通過推心置腹，言無不盡的對話來打開。我們堅信「理性」和「言語」的「力量」，希冀以歷史為母，實現互相平等與和平的共存。長久以來，我們對各位朋友高度的知性和深廣的見識抱以由衷的敬佩。我們呼籲，彼此都在各自的領域繼續做出堅韌不拔的努力，堅定不移地保持理性對話與和平意向，以使兩國國民的對立感情不至於滑向不可逆轉的狀態。

這篇聲明文是少數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學者的共識，自然無法代表日本全體的學術界，更無法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場，也不知能起多少的影響作用，但內容對於過去戰爭的問題有適度的反思，對未來東亞和平共存的願景，起了一個「融合」的開端，即如葛兆光所述，它是「自我認識」的一面「鏡子」，呼籲大家應當尊重歷史孕育出的共同「文化」和各自的「個

性」，以確立共同擁有「共存」之未來的意志。面對目前東北亞的緊張關係，也只有歷史研究者從歷史脈絡的演變，能客觀的看清楚彼此爭議的異同何在，聲明文建議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許是東亞各國醞釀共識與認同的基礎所在。

結語

東亞過去有一段因戰爭引發的「不幸的歷史」，但為構築新東亞的區域秩序，大家宜從「不幸的歷史」及各自的民族主義、一國主義的立場脫出，如葛兆光所述，文化認同已經難以回到古代東亞的時空環境，提議大家從自己周邊國家的文化和立場來觀察自我，放棄傳統和「自國中心主義」，筆者也建議彼此淡化文化主導權，再反向思考東亞內部各國文化認同的差異性，重新建構一個歷史共識和文化認同，才能理解對方想要什麼？能解決什麼問題而達到互利、雙贏的目標。只有以溝通化解誤會與偏見，以尊重取代忽視與謾罵，擱置爭議，東亞才有可能整合成功。因此，從差異中尋求共識，「鑑古思今」，「求同存異」的方向或許是一個解決「東亞共同體」如何可能的辦法。

